

清代海虞诗歌总集编纂考论

罗时进¹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江南乃人文荟萃之区,海虞堪称高峰之地。至清代诗人之多,创作之富,为江南其他县域难以比拟。地方诗歌总集编纂在清代江南也同样具有代表性。王应奎是清代海虞诗歌总集编纂的先行者,被赋予了“标志创立”的地位,《海虞诗苑》对几乎所有后来编纂者都有典范作用。然而后继者并未定于一尊,昉于一式,各方面问题相当丛杂。从康乾时代开始,就隐然存在一种“编纂角力”的现象。因各类清代海虞诗歌总集都是民间行为,而操持选政者大体皆为诸生阶层,故这种“编纂角力”往往形成于社会基层,表现于人际之间、家族之间、市镇之间。在编订人员之进退、编成稿本之明晦、编辑过程之缓速、编入作者之扬抑等现象中,都可能存在一些复杂因素,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海虞诗歌总集 《征刻海虞诗苑启》 标志创立 编纂角力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862X (2020) 03-0151-009

清代地方诗文集的编纂受到重视,其成果远胜往代。这既是文人向地方集聚的必然,也显示出文学权力下移的客观趋势。有清一代,江南地区社会底层集中的文人队伍尤其庞大,他们是一地文学的创作者,也是见证和记录者。编纂其地之诗文集,是见证和记录的方式之一。这方面如果要寻求“样本”的话,海虞(常熟古称)在诗文集编纂方面无论数量和质量都非常突出,必然进入视野。几年前我与他人合作整理了在清代海虞地方诗歌总集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王应奎《海虞诗苑》与瞿绍基《海虞诗苑续编》^[1],然刊行后陆续发现了一些文献史料,对了解清代海虞诗歌总集的编纂过程与地方文学文献的特点具有一定意义,故撰此文加以讨论,希望能够深入到某些编纂事件的细节中去,发现和理解一些问题。

一、顾士荣与《海虞诗苑》之编纂

清代江南的诗歌总集在各个层级上都有堪称起始性、标志性的著作,就海虞县域来说,无疑当推王应奎的《海虞诗苑》。这也是后人研究虞山诗歌发展史以及虞山诗派最基础的文学史料,但其编纂过程尚有较为隔膜之处。

先了解一下编纂者其人。王应奎,字东淑,号柳南,常熟人。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卒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少有才名,然应乡试八次未中,退居东乡凤塘桥,甚得同邑陈祖范(亦韩)、王峻(次山)、汪沈琇(西京)辈雅重,郡邑修志等事,必访问请益。嗜学汲古,至老不倦,“堆书及肩,而埋头于其中,緼岁耽耽,不知户外”^[1]。他与陈祖范等邑人“以道自重,发为文辞”,结“虞山吟社”^[2]。其诗文创作俱为可观,《新葺书斋作》云“小结书龕菜圃西,芦屏竹几称幽栖。当门旧种先生柳,绕壁新涂隐士泥。帘织虾须通社燕,篱编鹿眼限邻鸡。近同摩诘空诸有,斗室还将十笏题。”可谓清腴近道,典赡修洁。

值得注意的是,王应奎影响最大的《海虞诗苑》和《柳南随笔》都与同邑友人顾士荣有关。士荣(1689—1751),字文宁,

¹作者简介:罗时进(1956—),江苏东台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唐宋元明清诗文、地域与家族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18ZDA255)

自号甘樵翁。原籍太仓横泾，自曾祖父尔非公迁自常熟迎春门外，后士荣又迁于本邑梅里（李）镇，藏书楼抱影庐有名当时，为江南诗人、画家顾湘源（雪坡）之侄。湘源无子，所著《海粟集》六卷赖士荣得以付梓。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称其“为人端正纯雅，能诗善书，日以卖药自给。米薪既具，则闭肆读书，终日吟讽不辍，书声与市声时相错杂。”读其《曝书有感》“不暇傲羲皇，且抱残编曝。芸馥当风散，衣鱼随手扑。破损感年深，校阅怜毫秃。不惜倾囊购，不辞胝手录。夸人未全贫，堆床尚连屋。世缘已渐忘，爱此犹骨肉”^[3]，可见其为人和性情。顾、王二人交谊颇深，王柳南曾为其《抱影庐集》作序，而《柳南随笔序》亦为顾氏所撰。他在《序》中称东淑为“吾友”，叙述《随笔》六卷成书过程，赞其“搜遗佚，则可以补志乘；辨讹谬，则可以正沿习；以至考诗笔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缘此他“请君出之，为付剞氏”^[1]。

现在我们研究《海虞诗苑》之来龙去脉，主要依据王应奎亲属与后人的《跋》文。乾隆二十三年许澍（璜川散人）跋曰：

东淑王君，余之外兄也，所居曰柳南草堂，故又号柳南。自少颖悟，嗜书。年逾弱冠，游乡校，试辄高等，十踏省门，几遇终蹶，竟以诸生老，才不为世用，良可叹也。平昔肆力于诗、古文、辞，旁及百家杂说，撰述甚夥。初刊《柳南随笔》，晚修《奉贤县志》，归刻其所著《柳南诗文钞》若干卷，继又选刻《海虞诗苑》，未竟而歿，年七十有四。距未歿前数日，谓余曰：“《诗苑》以二十卷为规，已刻十六卷，今又编定三卷，将付梓。”迨歿后，搜其遗篋，仅得十七、十八两卷，而小传尚缺，其余佚不得诸。余因携所编定二卷，商于家孝廉君德园，拟补小传。德园阅其手钞篇目姓氏，云：“何不即照先生所定付梓，诗存人存，奚必述其生平而后可传耶？”余以其言为当，遂与柳南翁之嗣君辈谋付剞劂，因识大略如此。^{[4]654}

乾隆二十四年，王应奎之子锡畬、师韦，孙绍祖、绍昌写成跋文：

《海虞诗苑》共十八卷，自钱圆沙先生始，至童雪樵止，共一百八十二人，选定诗一千六百八十八首。先君子意主发潜阐幽，仿元遗山《中州集》、钱宗伯《列朝诗》之例，以诗存人，或以人存诗。苦心搜讨，历二十载。原拟二十四卷，先梓成十六卷，后以应奉贤修志之聘，未经续编。前年秋间，编辑十七、十八两卷，甫经脱稿，小传尚缺，遽遭大故。^{[4]654-655}

根据以上文字，结合陈祖范《序》以及《海虞诗苑凡例》大约可知，该书“原拟”的编纂擘画与实际编成的情况差距很大，且历经二十年而未成，这与其“应奉贤修志之聘”当无太多关系，参编者的人事变化或为主要原因，这方面顾士荣的《征刻海虞诗苑启》提供了参考信息。该文是清代江南诗歌总集编纂的重要史料，兹全录如下：

盖闻持人，情性端属。诗歌动我，敬恭厥惟桑梓；邑当胜壤，山川堪助吟情。典废《辅轩》篇，什空《緘书》槁。难望登诸东壁，还须录在西斋。维我虞山，宿号弦歌之里；缅兹曩哲，多游著作之林。毓秀钟奇，乌目耸文章之岭；流葩合绮，青城开锦绣之湖。藻思咀六代英华，雅韵漱三唐芳润。或垂纓戴纵，联车骑以言欢；或戢翼隐鳞，托田园以寄兴。或河梁赠答，字里绣出鸳鸯；或公宴绸缪，酒边赋成鸚鵡。或羈愁而长啸，握月担风；或疏放而狂歌，帷天席地。无不乃金乃玉，以雅以南。若乃朱鸟窗前，吟连白雪；青莲座下，句咏碧云。味合兰茝，几亚窈窕鲍妹；气殊蔬笋，直追癯可瘦樵。并握槊而怀铅，洵珠联而璧合。人言江花、丘锦，菁藻分自书台；我谓陆海、潘江，渊源通于墨井。振兴风雅，端有赖焉；鼓吹休明，斯为盛矣。独是远稽前代，采辑已有成书；近溯本朝，编摩尚无来者。岁月既久，散佚必多。狼藉遗编，杂唐书而粘屋；飘零残卷，代玄草以覆瓿。甚而溷掷锦囊，罔惜呕心于斑管；即使腹藏草稿，谁征遗像于白莲。绝轸投槩，悲深曩好；破瓢逐水，盼断知音。纵挾藻摘华，荧光犹闪于纸上；而残煤断简，蠹迹已满于行间。死而有知，神能无恫？况乎蔓草寒烟，难问马卿四壁；荒荆断棘，谁伤费氏一丘。当年觴咏之兰亭，但馀落照；此日往来之莲社，已失留题。眼中葛屐练裙，半是任防身后；径里春兰秋菊，渐迷刘沼生前。将使潜德之光，竟归沦没；名山之业，无自表章。此则艺林为之共伤，吾党于焉致慨者也。是用就予闻见，遍事搜寻；告我乡邦，广为罗致。卷无分于已刻、未刻，采不遗于一章、两章。抉精英以成编，拟剞劂而行世。庶俾翡翠兰苕，得供清赏；长鲸碧海，不废巨观。从此零落吟魂，幽无怨抑；丛残隽句，显有光华。窃附遗山之后尘，略仿《中州》凡例；不如东涧之大备，亦具《列朝》一斑。但水昧淄湜，漫欲以蠹测海；而龙迷真假，妄思从颡求珠。他年文献攸征，此际网罗恐漏。敢疏小启，冀引大篇。^{[5]41-42}

顾士荣参与《海虞诗苑》的史实一直若隐若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有“与王柳南同订《海虞诗苑》”^{[3]384}一语，然仅此而已，顾氏曾有《征刻海虞诗苑启》一事鲜为人知。该《启》后有友人附记：“甲子春，予方赴延陵书塾，蒙甘樵以右作见示，遂粘诸座次，俄失去。迨《诗苑》开雕，是《启》竟未刻入。癸巳秋日，在江皋，偶与徐仲米论四六文体有古近之别，窃喜尚能背诵。爰追录之。”^{[5]42}如果不是友人记诵追录，当时顾氏曾公开发《启》，征求诗稿的史实将湮没无闻。但为什么“《诗苑》开雕，是《启》竟未刻入”？知情者觉得有些不近情理。

据顾士荣《征刻海虞诗苑启》中“吾党于焉致慨者也。是用就予闻见，遍事搜寻；告我乡邦，广为罗致”知，起初顾氏是《海虞诗苑》编纂的主要倡导者，“附遗山之后尘，略仿《中州》凡例；不如东涧之大备，亦具《列朝》一斑”，是最初宗旨，也是全书的基本体例。以他与王应奎之友好关系看，“吾党”应指顾、王等人。《海虞诗苑》作为清代海虞诗歌总集系统中最重要的成果，最初倡导者之一的顾士荣功不可没。

王应奎卒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应奉贤修志之聘”前王氏已经“历二十载”了，也就是说《海虞诗苑》的编纂应启动于雍正末年（1735）前后。顾士荣乾隆五年（1740）序《柳南随笔》，乾隆九年（1744）在延陵出示《征刻海虞诗苑启》，这两件事都发生在《诗苑》编纂期间。如果顾氏出示其《启》仍有“征刻”之义的话，那么他在“二十载”编纂中应参与了近十年的工作，这与《海虞诗苑》前七卷署“顾士荣文宁校订”，而从第八卷起则另署他人基本相符——从第八卷编纂开始，顾氏已退出了这项工作。

在《海虞诗苑》“开雕”以后十余年（即前述癸巳，1773年），王、顾都已谢世，顾氏友人仍为《征刻海虞诗苑启》“竟未刻入”而抱憾，缘由固不足追究，但柳南后人及陈祖范在《序》《跋》中俱不提及顾士荣首倡之事，其拟订编纂宗旨与体例之经历尽为遮蔽，个中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编纂者之间潜在的角力。

虽然历史难以假设，但相信以顾氏对文献勤蒐博访的能力，如果始终参与，“吾党”戮力为之，“以二十卷为规”的擘画或是可以完成的，且不至于久不藏事。另外，在《海虞诗苑》最后一卷，顾士荣虽有诗选入，但小传阙如，今人对清代虞山诗史上一位尚具影响者，失去了直接了解其生平行履的第一手资料，颇可叹惜。

二、瞿本《海虞诗苑续编》与秦本《续海虞诗苑》

王应奎等人编纂《海虞诗苑》虽已尽寻访之力，但未能搜罗殆尽。他在《凡例》中也已说明：“究不能无遗，如归晟、陈芳绩两人，与顾宁人先生唱和，见之于亭林集中。此其诗当必可观，而姓氏翳如，访之邑人，罕有知者。此外湮没难考更不知凡几矣。”^{[4]653}这正是“续编”的开阔空间。

道光年间海虞著名藏书家、铁琴铜剑楼主人瞿绍基进一步搜访地方文学前辈的诗歌作品，编纂成了《海虞诗苑续编》。绍基，字厚培，又字荫棠，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生，道光十六年（1836）卒。李兆洛《养一斋续集》卷四《署阳湖县学训导瞿公墓志铭》称瞿氏“尤嗜书籍，值佳本必购之，藏至十万卷。”^[6]在收藏宋元典籍，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瞿氏可谓厥功甚伟，而对乡梓人文，他亦深具情怀。《续编》之首页，列出“海虞诗苑前编已刻姓氏”，继列“海虞诗苑续编姓氏”，这说明瞿氏是有意识地对《海虞诗苑》加以补充、完善。事实上《续编》撰成，清初至盛清时代海虞诗歌的谱系就更趋完整了。

瞿绍基《海虞诗苑续编》的编辑宗旨与王应奎是一致的，主要在于“备志乘阙轶”，而不在于“集其大成”。故将视点更多地集中于没有别集传世的那些作者，对于声名不显而诗作较佳者尤注意采择。这对于从乡土基层的视野显示一地之文学全貌，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其体例也继承了《海虞诗苑》，同样是以地系诗，亦因诗存人，保存了大量的作者生平、家世、创作情况，部分作者的子嗣亦有载录，对深入研究虞山诗派以及海虞一地清代家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应当提及的是，瞿氏在搜集诗歌作品时不仅仅依靠存世文献，而且探访于亲好之家，寻索于友朋篋案。虽然限于搜集的条件，有些作家的介绍只有片言只语，但今天看来，也已如吉光片羽。且由于瞿绍基《海虞诗苑续编》属于对《海虞诗苑》的拾遗补阙，加之时

代远后于王氏，故搜集前人作品的难度更大。故此，《续编》更显得弥足珍贵。

《海虞诗苑续编》长期束之芸阁，几近尘封状态，其版本的实际情况很少为世人了解，而现有的目录信息多有舛误。此书系瞿绍基编辑，屈振镛校订，经人钞写，未曾付梓。转手多家后，现为上海图书馆收藏。^{〔2〕}该书以六卷题标，这在现存卷册上是有根据的，但细检全书，发现实际上并无三、四两卷，而五、六两卷却重复出现。经比勘全书各卷之序次和钞录情况，知此书原为六卷，编成后形成了两个钞本，即初钞本和再钞本。再钞本与初钞本相比，间见增删，但整体上显得较为清致，这在当时或为定本。但流传过程中初钞本和再钞本都有散佚，初钞本存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再钞本仅存卷五、卷六。后来收藏者合所存之六卷于一体，而又误标初钞本卷五、卷六为卷三、卷四，则此书貌似全璧，实残缺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该书存录仍相当可观，有论者谓该书“辑汤愈、邵伦清、李之琳、黄步昌、钱荣……诸人之诗”，认为“此集所辑均为乾隆时期人”^{〔7〕}，这是误解。汤愈等只是瞿本第五卷所录之一部分而已，其实第一卷、第二卷俱为乾隆朝之前诗人，且有意选录《海虞诗苑》所未及者，足见“续补”之义。

根据学者研究^{〔3〕}，秦昂若（字家千）亦曾辑有《海虞诗苑续编》，惜未见。然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四十存《海虞诗苑续编序》一篇，使相关情况得以揭示：

《诗》之有《风》，一方之风俗盛衰见焉。美者足以感发善心，刺者可以惩创逸志，使人优游讽咏，以化其不善而底于善。故虽民俗之歌谣，上以贡之天子，列之乐官。古者于诗之为教，其用意微矣哉！自采风废，而人不知有诗。学士大夫辄鄙为小技而不为，传者类多侍从应制、黼黻太平之作，而美刺之义亡矣。美刺之义亡而善恶混，善恶混而廉耻丧，廉耻丧而风俗日以衰。有心世道者，诚能取前人之作，别择贞淫，用以激励讽劝，以自成一乡之风，亦庶几采风之遗意也。吾邑自王柳南辑《海虞诗苑》，始顺治朝，迄雍正，得十六卷，彬彬乎盛矣。今自乾、嘉以来，历八十余稔，其间人才辈出；不有以哀集之，则穷阎漏屋之士，惧遂湮没。于是，秦君亦园奋然思继柳南而起，广搜博采，得三百三十余人，厘为十一卷，附以“游寓”一卷；仍依王氏之例，人系小传，使览者读诗而知其人。其编次，则太仓徐君石渠之力居多焉。书成，索为弁其端。余尝观《江湖》之编、《中州》之集，以逮顾瑛、偶桓、徐庸之所辑，一代不过数十家，一乡得数人为多。今以滨海一隅之地，而搜采若是之富，其用力可谓勤矣。虽其间曼衍杂陈，繁响竞奏，而村讴渔笛之中，未必无美刺存焉。世有采风者，其亦将有取乎是哉？^{〔8〕}

这又为海虞一地诗歌文献编纂平添了一个“学案”，至少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此书是否编成？二是此书是否称《海虞诗苑续编》？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从孙原湘《序》中所云“得三百三十余人，厘为十一卷，附以‘游寓’一卷；仍依王氏之例，人系小传……书成，索为弁其端”之语来看，这本书已经编竣，“今以滨海一隅之地，而搜采若是之富，其用力可谓勤矣”，更强化“书成”且作者亲见其稿的认知。但除了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艺文志》中留有依稀记载外，此书不见于文献著录。今人《江苏地方文献书目》蒐集极为倾力，但《海虞诗苑续编》唯有瞿本而未载秦本。而孙《序》提到的“其编次则太仓徐君石渠之力居多”的那位徐校（号石渠）在《幽光集序》中有如下一段话值得注意：“虞山自钱、冯两家提唱宗风，人握灵蛇，家抱荆玉；风流宏长，甲于一郡。王柳南《诗苑》一编，搜罗遗佚，传其诗，亦传其人也。百年来复接无人，沉埋足虑。秦生昂若思续王氏之书，不果。已而去显存晦，掇拾若干人、诗若干首，题曰《幽光集》，将付梓人，而问序于余……秦生景行曩哲，追念故人；嘘已烬之灰，泽久枯之骨，俾诸君子不遇于生前，犹得传于身后，岂非盛德事哉？是为序。”^{〔9〕}应该说，作为原共同编辑者，徐校明确说“秦生昂若思续王氏之书，不果”，绝非空穴来风。

再讨论第二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秦昂若与徐校共同编纂一部接续王应奎《海虞诗苑》的诗歌总集有周详计划，而且付诸实施。“得三百三十余人，厘为十一卷，附以‘游寓’一卷”，既可看作擘画，也可看作实施情况。尚有更为具体的讯息：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艺文志》有“秦本”著录云：“续海虞诗苑十四卷：依王氏应奎例，选清代诗二千余首，都三百余人，人各系以小传，孙原湘等序。《天真阁集》作十二卷。”^{〔10〕}这个条目显然参照了孙原湘之《序》，但有两点不同：一是书名不是《海虞诗苑续编》，而是《续海虞诗苑》；二是卷数不同，不是十二卷，而是十四卷。关于《续海虞诗苑》这一书名，

在光绪《常昭合志》卷三十《人物》中有佐证。《人物》（九）记载钱璋其人云：“钱璋，字柔来。读书务穷旨要，补诸生，试高等。晚年键户不出，著《治平补要》，年八十卒。子嵘，字柱高，号东霞，年垂五十始学吟，有《性余集》，多老庄家言。”^[11]其文献出处即注明“《续海虞诗苑》，参《支溪志》”。钱璋曾为常熟马荃代笔作画，则为顺康朝人⁽⁵⁾，年辈早于王应奎，并未见载王氏《海虞诗苑》与瞿氏《海虞诗苑续编》第一、第二卷⁽⁴⁾，则必为秦昂若编纂著作所收录者。由此亦可证，秦本是以《续海虞诗苑》之名传世的。朱则杰先生说：“书名作《续海虞诗苑》，不知是后来确实改名了，还是本来就没有定名？”^[12]所疑极是。我想应是初无定名，孙原湘作《序》乃自取其义而述之。

现大体可知，秦昂若起初有续王应奎《海虞诗苑》之编的计划，徐校参与编校，后因事未果，“去显存晦，掇拾若干人、诗若干首”成《幽光集》，徐校为之作序。至于为何《幽光集》不存⁽⁶⁾，又出现了秦本《续海虞诗苑》，或有难为人知的复杂原因。更需要注意的是，秦本似乎有稿本流传过，何以渐而湮没不闻？尚待进一步考证，发覆其微。

三、《海虞诗话》及其他乡镇诗歌文献

瞿本也好，秦本也好，皆属编纂接力，仍有拓展可能。另外海虞之于江南，是其一个部分；而海虞境内亦含不同层级之地，各地都有集成诗歌精粹，使小地域文化得以传承的内在愿望。缘此，清代海虞诗歌总集编纂的局面趋于丰富而复杂。

与瞿绍基同时代而年辈稍晚的另一位诗人、学者单学傅也曾从事过清代海虞地域诗歌的编辑工作。学傅，字师白，号钧翁，常熟熟渚渡人。嘉庆五年（1800）庠生。少时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数行，特擅记诵，为文博瞻，深为江苏督学钱樾赏识，乡前辈吴蔚光（竹桥）延至家中，呼为“小友”。《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三〇、《晚晴簃诗汇》卷一三三有传，有诗集《钓渚诗选》传世。著述甚富，种类亦多，其中《海虞诗话》十六卷所收清初至道光时同邑作者四百余人，颇为后人所重。这部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目的几乎与瞿绍基完全相同，即进一步对王应奎《海虞诗苑》加以补充，以对海虞一地之诗学起到“阐微显幽”的作用。单学傅在全稿初成尚未校订时遽歿，然其初稿后来为同邑庞邛亭所得，从而获得校刊行世的机会。

单学傅《海虞诗话自序》云：“惟就柳南所不及收，而及见其诗集，并后辈以诗来质者，摘选所爱，辑为诗话。”柳南之外，他提及的只有乡先辈凌竹（南楼）的“邑人诗十二卷”。所编纂《海虞诗话》晚于瞿氏，但似乎不知《海虞诗苑续编》编纂情况，《海虞诗话》与《海虞诗苑续编》仿佛是两条平行线在延伸。二书所录诗人和作品颇有相重，文本却有差异。以单嘉猷为例，《海虞诗苑编》卷一载：

嘉猷，字徽仲，邑诸生。娴威仪，善词令，作诗、古文，落笔数千言，未尝起草，然不自珍惜，随手散去。年三十四遽卒，故所传绝少，偶从败簏中搜得数首录之。

《新霁》

积雨林薄昏，湿云漫岩屋。出门望阴晴，快睹开初旭。高峰耸螺髻，润泽比膏沐。池塘激滟波，半没新生竹。草深蛙黾喜，繁响出丛绿。落花淡无言，点点洒春服。老农急磨镰，陇上来稔熟。^{[4]393-394}

《海虞诗话》卷一同样列“单嘉猷”，称“单文学嘉猷，字徽仲。顺治八年游泮，为文敏速，邑中文士多从之游。诗词书法皆工。”接着同样录《新霁》诗，然诗末多“往矣适予情，正可骑黄犊”二句。^{[13]10}《海虞诗苑续编》又列其《感题二首》：“曾经怀袖十年春，此日开缄恨转新。只看簪花先堕泪，伤心标格总如人。”“寄我寒衣客路秋，墨痕迹与泪痕流。蠹鱼也识相思苦，触到关情字便休。”而《海虞诗话》未录《感题》，另录其《咏读书灯》“莫嫌如豆灯光小，照见千秋万古来”二句，并评曰“至今人犹传诵”。

据此可知，《续编》和《诗话》的采编来源并不相同。与《续编》仅存百数十人相比，《诗话》所录约四百人，可谓大增。

其中不但有孙原湘、吴嵎、蒋因培、言朝标、翁咸封、翁心存、蒋宝龄等声名较著的诗人，更有包括女性诗人在内的大量海虞地方家族文人。单氏最重视者即家族关系，而本宗在其《诗话》中堪称首重，所录有单嘉猷、单云瑞、单郑思、单谟、单勋、单际周、单德棻、单继盛、单学敏、单俊明、单学太、单学元等。其次所重为“小地域”，即他所出生与生活的钓渚。他以为“钓渚地偏，居人不满古之一党，而蜚声黄序者，鹊起林立”^{[5]730}，故入选者明显较他处为多。另外就是师友关系圈，如吴蔚光、张尔旦、董锡光、席祐、范章承、金大椿、吴轮光、姚锡范、范柏燠等皆属此类。

这是一部以“海虞”为名却带有“小地域”诗学色彩的著作，单学傅《海虞诗话题辞》言：“搜访辛勤且卅年，一乡遗籍渐成编。”“卅年呕出心何限，东激编余可拾遗。”^{[13]3} 客观来看，其拾遗“东激编余”不足，成编“一乡遗籍”实有功绩。

清代海虞一地的诗歌总集以“一乡遗籍”为范围的为数不少，现存的尚有赵允怀辑《支溪诗录》，冯景元辑、徐家驹参订《白茆诗存》和《泖溪诗存》，管文植辑《桂村诗钞》，何兆麟辑《桂村诗钞》，徐兆玮辑《续桂村诗钞》，王伊辑《贵泾诗存》，倪赐辑《语溪诗存》，倪赐原编、谭天成增辑、赵元溥续编《唐墅诗存》，凡九部。⁽⁷⁾ 这些市镇级诗歌总集的编纂目的在于为“小地域”呈现风雅气象，存一代诗史，阐往哲而启来者，这里以《支溪诗录》略加说明。季锡畴《支溪诗录序》云：

逮虞东先生以经术为巨儒，东南人士奉为大师，时则二山何氏、南村徐氏、象川张氏来自崇川，少霞周氏、古愚姚氏起自里中，皆刻志媚学、揖让古贤，以主持风雅为职志，而褰裳联襪以趋坛坫者接踵而兴，号称极盛。迨诸老徂谢，则有吾师徐石渠先生、姚丈柳塘揶揄其间，文人不绝。近则赵子闾乡为馆甥于顾，旋卜居其地，毅然以斯文为己任，四方名士往来如织……相与跌宕文史，流连花月，或分题刻韵，或读画评书，意见互歧，则往复辨难，齿击目张，极酣喜淋漓之致……虞山古文文学乡，支溪一隅，山川灵秀，实钟毓焉。士食旧德，芳菲未沫，异日必有继闾乡之绪而起者。则是编之辑，所以阐往哲，启方来，其义可深长思已。^[14]

赵允怀《自序》称其所录“大都夺诸蟬蠹，登于简册”，可见珍贵。需要注意的是，此集编成于道光二十年（1840），与王应奎《海虞诗苑》成稿相距大约一个世纪。无论编辑意图或体例都有明显的继承性，这与《海虞诗苑续编》、《海虞诗话》等有共同之处，但似乎又显示出更为显著的建立和维护诗学文献“小传统”的愿望。

该书第一卷陶式玉、何适、仲是保、庞龙、冯行贞等皆见于王应奎《海虞诗苑》，在诗人小传中都有说明。但小传除采用《海虞诗苑》的传文外，又以《支溪小志》等本乡文献酌补，更为具体。文字亦有差异，如陶式玉《和钱尔弢送春杂感》，《海虞诗苑》卷二题作《和钱湘灵送春杂感》；冯行贞《过西庵斋次师磬韵》“来觅静中味，闲斂雨后山”一联，《海虞诗苑》卷十二作“诗觅静中味，毫濡雨后山”，显然所用底本不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书部分作品的归属与《海虞诗苑》存在明显分歧。如《海虞诗苑》卷三潘荣名下录《芙蓉庄听含光法师论华严玄谈即用四字为韵》四首，该书则归于高于蕃名下，且辩证云：“此四诗，毛子晋《隐湖唱和》作汤鸿，王柳南《海虞诗苑》作潘荣，顾虞东《支溪小志》又属之高于蕃。纷纷争夺，莫得主名，姑录之云尔。”^[15] 显然，编者更注重本乡志书的记载，并不以王应奎《海虞诗苑》为圭臬。

清代海虞市镇级诗歌总集的地方“小传统”色彩，还表现在对本地名宗大族（尤其是主姓家族）的突显上。如赵允怀年少孤贫，“稍长为支溪顾氏赘婿。顾，名宗也”，虽然“溪山旧族为最多”^[15]，《支溪诗录》所收 90 人，仍录有顾德基、顾茂远、顾茂位、顾云峇等 10 人，占比超过十分之一；《唐墅诗存》所收 255 人，当地许姓大族即录有许儒、许士刚、许士柔、许士勤、许瑶、许玉森、许嘉祐、许灏等 26 人，同样占十分之一强；桂村以何姓为主姓⁽⁸⁾，何兆麟辑《桂村诗钞》凡收 34 人，何氏家族则有何允泓、何述稷、何适、何忠相等 8 人，占比近四分之一；管文植辑《桂村诗钞》凡录 69 人，何姓亦有何述稷、何述皋、何云、何志孝等 12 人，比例亦显重。⁽⁹⁾ 这既反映出著姓望族在一地文脉演进中的客观影响，也体现了编纂者的主观意图。

四、关于“标志创立”与“编纂角力”现象

江南乃人文荟萃之区，海虞堪称高峰之地。至清代诗人之多，创作之富，为江南其他县域所难以比拟。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种类、数量和水平，在清代江南也同样具有优势。如果将各种总集汇集起来，诗脉传承发展之盛况可见。

“文学传统由幸存下来的文学作品构成”^[15]，而文学作品得以“幸存”有不同的原因，社会地位、文坛影响、家族力量、友朋脉络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地方性文人尤其是县域范围的地方文人，其作品流传则往往依赖于一地文学总集的编纂，故“选政”便成为一种创立地方文学史的“权力”，而越具有标志性的总集，选政之权越为显要。这种权力的赋予或承认，是被一定的规则所控制的，不可能流为一种自然性的、无意识的行为。

明清两代，生员在县域有着特殊地位和作用，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话语权和舆论形成力，其中之突出者便具有担纲“选政”的最大可能。这便是明清两代绝大部分地方文学总集都是由具有诸生以上身份者主纂的原因，可能有个别例外，但几率很小。就此比较王应奎与顾士荣，前者为诸生，且曾为“虞山吟社”之主盟，比后者文坛地位与社会影响高出许多。^[10]这应该是王氏能够长期主持《海虞诗苑》选政，并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原因，而顾氏在此项事业中其名不彰，与缺乏身份认同有关，在底层文学活动运行的规则中不难找到答案。

历代诗选，兼顾文学的纯粹性与历史的久传性，将以诗存史作为宗旨。在“诗”与“人”之间，以诗存人是首要原则，以人存诗是调节策略。清代地方性诗选往往祖述元好问《中州集》和钱谦益《列朝诗集》的体例，在以地系人的总前提下以诗存人，王应奎《海虞诗苑》亦循此前例。因此我们看到，部分作者颇负才藻，驰名一时，但别集尽失，仅在唱和集或他人诗集中存留一二，亦钩稽录存，如《海虞诗苑》卷三选陆钺诗唯《璎珞树》一首、何述稷唯《苦雨》一首，皆属此种情况。如此该书诗人名下多则数十首，少则三五首，孤篇独存的现象也每每见之。需要注意的是，王氏在《凡例》中还特立一项：“是集之选，以诗存人也，而亦以人存诗。苟其人可传，诗虽不甚公，间亦采入。”^{[4]652}这显然兼顾到人地关系，对平衡诗歌的纯粹性与地方知识的全面性来说，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实施路径。

历史是由“事件”构成的，地方史亦如此。作为地方诗史与“事”的关联密切，可以说“人”是地方诗史的主体骨骼，而“事”是其血肉。如何使《海虞诗苑》血肉丰满，除了在选择诗注重以诗纪事外，王应奎在《凡例》中专门引用钱谦益《与施伟长书》语作为规范：“小传之作，务在采取佳事佳话以为点缀，正不必多引列传、家谱板实语，没却前人风华也。”^{[4]652}《海虞诗苑》的传文纪事裨益补史，书写振华腾采，其作用绝不止于色彩点缀。

王应奎作为清代海虞诗歌总集编纂的先行者，《海虞诗苑》无疑形成了标志创立的影响，不仅对后人王伊（按，伊乃柳南之玄孙）辑《贵泾诗存》有直接启示，对几乎所有后来从事海虞地方诗集的编纂者都有典范作用。然而后继者并未定于一尊，昉于一式，各方面的问题相当丛杂。即使王伊，在方外诗人如何入选上并未遵循王应奎“本非邑人，而移锡在此，以至终老者”^{[4]653}方入选的原则，认为方外不必拘定乡人，其有来寺^葑染及移锡主席者便应采入。而《海虞诗苑》选录诗作的不均衡性和特例处理方式，更为后来操选政者编纂角力留下了空间。

编纂角力是文化话语权进入选政操作层面的体现：柄权操选，畸重畸轻。对县域总集编纂而言主要是何人主持选政、各家选录多少作品的问题。对市镇总集编纂来说就比较复杂了，在市镇，宗族势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乡绅占有强势话语权，这对诗歌总集的编纂必有一定影响。因某作者往往占籍、卜居多处则存在如何以地系人的问题，主姓和其他宗族共生的环境则存在如何平衡选目的问题，人际有亲疏远近则存在如何平衡的问题，方外、流寓影响不等则存在如何甄选的问题，尚有诗学观念的偏向、个人诗才的展现等因素都可能成为角力的缘由。

从康乾时代开始，就隐然看到一种编纂角力的现象存在，愈后愈烈，尤其在乡镇诗集的编纂中，民间行为特征更为明显，市镇之间、家族之间、人际之间都形成角力场域。细究各集编订人员之进退、编成稿本之明晦、编辑进程之速缓，或者编稿收录中不同姓氏之多寡，或者编纂过程中炫才擅改、自我标榜形成的冲突，都可以看到编者选择和群体制衡的角力魅影。

这里不妨谈一下编纂者对蒐访稿件的删选与修改情况。一般来说本着以诗存人之旨，孤篇存世者往往照录；但作品较多者

则必择优而取，瞿本《海虞诗苑续编》每有“此诗斟酌去留”的眉批即可证。其中对组诗选录多少则依凭编纂者对全书体量的把握、对作品价值的评鉴、对诗歌风格的偏好了。如庞龙《行舟十咏》在《海虞诗苑》卷二中全录，在《支溪诗录》卷一则仅取六首，这种删选行为尚有尺度，对原作一般以不加改纂为原则。但大幅改动者有之，甚至不乏逞臆而为的情况，如桂村孙鼎六《秋闺报罢》原诗为：“归来引镜看头颅，席帽依然一故吾。坐对秋风长叹息，恐教白日更蹉跎。编残未了经生业，岁暮还思两士瞿。敢谓文章憎命达，文章知己在穷途。”编纂稿改为：“归来引镜看头颅，席帽依然一故吾。坐对秋风长叹息，莫教闲日自嬉娱。穷途祇自知甘苦，岁暮何须计有无。敢谓文章憎命达，先鞭策励向云衢。”^[16]对比可知，后四句几乎完全重写了。

群体制衡既有社会力量的互力权衡，也有一众编订与参评人员的批评制约。海虞横沥塘南岸、北岸居住着何姓与管姓两大高门望族，何姓属当地主姓，历经世变而门第不衰，而管姓亦具有很强的话语权，《桂村诗钞》《桂村文录》皆由何、管两家操选政。徐兆玮题何兆麟《桂村诗钞》云：“何兆麟小园所辑凡三卷，与管氏选本互有详略。”^[17]“互有详略”四字透露出的正是畸重畸轻的信息。管文植所辑《桂村诗钞》，其中颇多管氏家族的唱和诗，王伊见之就极为不屑，直称：“《桂村诗钞》下卷，共得三十二人，其中惟《三闺秀诗草》可传，毫无遗憾。以上无甚佳什，与上卷前列诸公有霄壤之别。是编虽以人存诗，然与其滥收，遗为口实，不如简择，以期可传可诵。鄙意拟再删去之十之二三，定为善本。”^[18]对管家的诸多唱和诗和一些质量不佳的作品，在何兆麟所辑《桂村诗钞》中便毫不手软地删削殆尽。

当然，无论编纂角力以何种目的、何种力量、何种形态出现，一方面我们赞赏海虞诗歌总集编纂者维护纯粹文学性的努力，一方面也充分肯定那些博蒐广辑、发潜阐幽者的贡献。站在历史风烟之后回望，可以看到他们努力和贡献之可贵：在地方诗歌精粹得以保存的同时，大量别集不存的诗人得以传名，许多“上不入四库，次不入《别裁》”^[16]的作品得以流传，不至于“其生也，才横一时，名满天壤；其没也，雾灭烟消，渐归乌有”^[16]，清代江南诗坛的丰富性、高原感由此得到生动展现。一些稿本对原作的修订印迹尚在，也为未来《全清诗》的编纂提供了重要文学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对这种“编纂角力”仍可正面视之，并由此激发探讨的兴趣。

参考文献：

[1] 顾士荣. 柳南随笔序[M]//王应奎. 柳南随笔·续笔. 北京：中华书局，1983:1.

[2] 沈德潜. 《归愚文钞》卷十二·王东淑柳南诗草序[G]//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4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63.

[3] 叶昌炽. 藏书纪事诗[M].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384.

[4] 王应奎，瞿绍基，编纂. 罗时进，王文荣，点校. 海虞诗苑·海虞诗苑续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 潘镐. 梅李文献小志·集文[G]//沈秋农，曹培根，编. 常熟乡镇旧志集成. 扬州：广陵书社，2007.

[6] 李兆洛. 《养一斋文集续编》卷四·署阳湖县训导瞿公墓志铭[G]//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3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1.

[7] 江庆柏，主编. 江苏地方文献书目（下）[K]. 扬州：广陵书社，2013:1080.

[8] 孙原湘. 天真阁集[M]//续修四库全书（148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4.

[9] 徐校. 徐石渠文钞[M]. 道光十二年刻本.

[10]丁祖荫,等,纂修.常昭合志[M].民国38年(1949)刻本.

[11]郑钟祥,张瀛,庞鸿文,纂修.光绪常昭合志[M].清光绪三十年活字本:31.

[12]朱则杰.清诗总集丛考——以《海虞诗苑续编》等为中心[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9,(1).

[13]单学傅.海虞诗话[M]//续修四库全书(17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赵允怀,辑.支溪诗录[M].道光二十年刻本.

[15]E·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09.

[16]管鐸,辑.何兆麟,评.桂村文录[M].清稿本.

[17]徐兆玮.桂村诗钞·题词[M]//何兆麟,辑.桂村诗钞.清稿本.

[18]王伊.桂村诗钞·跋[M]//管文植,辑.桂村诗钞.清稿本.

注释:

1 参见王应奎、瞿绍基编纂,罗时进、王文荣点校《海虞诗苑·海虞诗苑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2 今人相关文献书目著录该书,谓“经查上图,已无此书”,不确。见江庆柏《江苏地方文献书目》下册,广陵书社2013年版,第1080页。

3 参读朱则杰《清诗总集丛考——以〈海虞诗苑续编〉等为中心》,《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蒙朱则杰先生寄赠论文,提示相关史料,深表谢忱。

4 光绪《常昭合志》卷三十《人物》(九)将其列于陶宗侃之后,周台、徐兰、陈协之前,可见年辈较早。

5 在瞿本中,顺康时代诗人皆见于第一、第二卷,而瞿本中未见“钱璋”其人。

6 今传《虞邑幽光集》为常熟杨氏辑刊,与徐序《幽光集》不同。

7 参见唐莉《清代江南乡镇文人集群与诗歌总集研究:以苏州府为中心的讨论》,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按,清代海虞地方诗歌总集甚多,翁同龢即选编过《虞山七家诗》,不胜枚举。另外从清人纂修常熟地方志中可以看出,道咸以来常熟一地乡镇诗集尚不止所述九种。故此处以“现存”言之,待访工作需要继续进行。

8 崇祯年间所撰《常熟县志》卷一云:“邑之东,唐市、李市、何市、归市、东徐市、张市、吴市,各有主姓焉。”见《崇祯》《常熟县志》民国五年抄本,第7页。

9 以上统计参考了唐莉《清代江南乡镇文人集群与诗歌总集研究:以苏州府为中心的讨论》,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吕姝焱《文学世家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

10 从目前的史料看，未见顾士荣为诸生的记载。